

浙江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世纪文潮学术书系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

王嘉良 王 侃 景秀明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

王嘉良 王侃 景秀明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

王嘉良、王侃、景秀明 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王嘉良, 王侃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6
(世纪文潮学术书系)
ISBN 7-5039-2560-4

I. 浙… II. ①王…②王… III. ①现代文学—文
学研究—中国②作家—人物研究—浙江—现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4252 号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

著 者 王嘉良等
责任编辑 李世跃
责任校对 张 莉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 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7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560-4/G·415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本书撰稿者

王嘉良 王 侃 景秀明
朱利民 马 嘉 洪晨焰 赵 瑞

引 论

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上，曾凸现一种声势壮阔的“浙江潮”文学奇观：阵容整齐的新文学“浙军”起自东海之滨、钱江两岸，稳稳地洒向全国、走向世界，占据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如此盛况，其他地域无出其右。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著名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在谈到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似乎还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例如，浙江自五四新文学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

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这种突出的文学现象应该怎样解释？除了越人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耻为人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之外，是不是和最近 100 多年来浙江省得风气之先，反清救国走在前列，去外国的留学生也特别多有关系呢？在浙江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确实最早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渗入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如愿意买洋货，海员的家庭观念淡薄，市侩势利心日炽等），这些区域性的特点，是否和上述文学现象也密切相关呢？实在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从这个切入口进去，也许可以深挖出很多东西。^①

严先生的这段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浙江潮”现象，其意义不只是在揭橥地域文学经验的层面上，以此为切入口，的确可以在地域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深挖出许多于总结中国新文学发展规律极具观照意义的东西。

文学的“地域学”研究——从特定地域的地理区域种型、历史文化传统造就的独特文学现象，透视其生成背景、展开方式、表现形态，以此为个案，探寻整体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是深化文学研究所必须的。中外文学历史证明，某些特定地域的文学现象因其积淀深厚、形态完备，且总是引领潮流之先，往往具有映照整体文学的意义。就中国新文学研究而言，“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便当以浙江地域为最要。这不独表现在阵容壮观的新文学“浙军”从这块地域走出，而且他们对于中国新文学所起的大都是开创性作用，这已在事实上形成了为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别地作家所无可取代的优势，其所包含的“典型性”、代表性意义是不待论证的；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表象背后潜存的深层次意义：正是这一地域深潜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延伸及其在近现代“得风气之先”，其所激荡的思想文化潮流构成一轮新的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拓中国新文学、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从而使这一地域文学个案在整个中国新文学中的“典型性”意义更为彰显。

事实正是这样，浙江新文学作家对于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典型性”意义呈示，包括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在新文学各个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一群体在弘扬地域文化精神与文化传统方面得到验证。探究特定地域的文化现象对于一种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传统的延续性、承传性视角切入至关重要。文化涵示文学的质地与风貌，这可以在多个文化层面得到印证，诸如地理环境、气候物象、风俗习惯等等对于文学的无可忽视的影响力，但其中最重要的应是文化精神、文化传统。诚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所说的：“文化是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① 由是，文化传统所产生的“价值”，对于文学的生成与变革就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就浙江地域文化传统而论，它应有“近传统”与“远传统”之分。“远传统”即通常所说的古越文化精神，所谓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等等文化心理因素便是其重要表征。这些积淀在越人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带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人格在后世产生影响。然而对近、现代浙江知识分子最具亲和力与影响力，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冲击力、改造力的应是“近传统”，即宋、明以来启蒙文化思潮中形成的两浙文化传统，

^① 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这一传统所具有的潜能对处于急剧震荡中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界施加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形成对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占着思想文化“支配地位”的“大传统”的有力冲击，中国文化发生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终至产生颠覆“大传统”之势。^① 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其地理区位优势使其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中西文化大冲撞之际得风气之先，而其积淀深厚的启蒙文化传统又在“面海的中国”地域处于文化领先优势，这就有可能使其在新世纪的文化大潮中更有所作为。由此看来，探讨“面海中国”的地域文化冲击波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强势影响，恰恰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揭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引领 20 世纪文学新潮的缘由所在，也是浙江地域文学之能成为中国新文学典型个案的独特性所在。这一理念将是我们讨论“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并努力使之贯穿在各种文学思潮、各种文学现象的论述中。

由于典型个案的存在价值，“浙江潮”作为特定地域文学的研究价值实际上已经呈现。它集中展示的是作为起于地域的一种强大文学潮流对于整体文学的观照意义。这里，我们使用“浙江潮”的概念，一方面是指词语本身所固有的如钱江大潮般澎湃激荡的气势，生动地传达出起自浙江的文学潮流的汹涌之势；另一方面也是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期两个与文学有密切关联的刊物名称的借指，从而赋予这一概念以更具实质性的内涵。这两个刊物，一一是于 1902 年由浙江留日学生蒋百里、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浙江潮》。“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祖国，其心惻以动，乃谋其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 11—1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①其后遂有新一代浙江学人“发大声于海上”的激越呼声。二是于抗战高涨期的1938年在金华创刊的《浙江潮》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其沿用前贤的刊名，表达的同样是浙江文化（文学）工作者誓用文字与强敌抗争的如虹气势：“‘春雨楼头尺把箫，何时归看浙江潮？’我们没有这样诗人骚客式的感伤，我们要占据这文字的堡垒，向敌人开炮；我们有的是铁与血，不达到收复失地，歼灭倭寇，誓不停止。”^②“浙江潮”所显示的如此磅礴的气势，分明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浙江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作为一个能指意象，“浙江潮”同样涵示着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浙江新文学群体的壮观景象，涵示着这个群体在中国新文学舞台上必会有精彩出演。应当说，这个出自“面海的中国”的新文学群体的形成具有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它给中国新文学提供的宝贵经验也是多方面的。

我们从“思潮论”与“创作论”两大块论述，就是旨在较为全面挖掘“浙江潮”的丰富内涵。从思潮方面讲，浙江新文学作家勇于接纳世界先进文学新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逐层推进，乃至新文学社团、流派的创建、新文学文体意识的觉醒等等，都有开拓者、引领者之功。就创作方面言，则对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在内的各类文学创作，浙江新文学作家大都率先探索与尝试，因而也就有开创者劳绩，为中国新文学创作日渐走向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们始终认为，对这些现象展示，也许揭示“成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探讨成就背后所蕴涵的“经验”，即这个新文学群体何以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能量，它给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何种有益的启示，这可能是研究“浙江潮”文学现象的真正意义所在。

研究“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还应当指出的是，这

① 《〈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1902年10月。

② 《〈浙江潮〉潮头语》，载《浙江潮》，1938年10月。

两者之间始终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浙江潮”在整个新文学潮中的确处于挺立潮头的位置，浙江新文学群体的凝聚及其创造的成绩、提供的经验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浙江潮”的形成与发展也非孤立现象，中国文学的深厚积淀及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变革的可能性，以及一大批来自各地的新文学作家合力造就一个声势壮阔的新文学运动，遂有一个地域文学群体的乘势而起。它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造就，是中国新文学整体格局的变化为这个新文学群体的聚合提供了先天条件；这个群体惟有融合在整体中，不断汲取异质文化丰富其自身，始得有其辉煌。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互动发展。这说明对“浙江潮”文学现象的审视，对其作历史定位，估量其历史价值，既不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整体的文学氛围，同时也不可忽视那些善于把握历史捕捉机遇的作家面对历史的急切召唤所作的创造性努力。认识这一点，对于促进整体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对于推动地域文学的进展尤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研究、总结新文学“浙江潮”的一个显在意义，便在于汲取浙江新文学先驱的宝贵经验为当代浙江文学自身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纵观浙江现、当代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文学成就上前后两个五十年存在着强烈反差。如果说，新文学时期的“浙军”曾显示出一种浩荡气势，其以整体推出态势对新文学阵地的广泛占领曾令国人歆羡不已，那么“当代”期这一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国内四处崛起、占据当代文坛要津的文学队伍是晋军、湘军、川军、鲁军等等。这里留给当代浙江作家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同在浙江地，同是浙江人，同处鱼米之乡的环境，同为文物之邦的后裔，何以相距竟会如此之遥？这就需要去寻找其中的深层次原因。诚然，浙江新文学前辈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奇迹的，而历史不能简单重复，单纯以

“历史”去要求后来者是一种苛求；然而在当代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别地作家能够作出突出成就而浙江却滞后了，这肯定还有自身的原因。前辈作家能够创造辉煌，固然有历史赐予的一面，但同他们善于把握历史与机遇的积极进取精神也不无关联。整体与局部的互动发展，是以“互动”为前提的。重温新文学“浙江潮”的经验，从前辈作家走过的“光荣的荆棘路”中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互动”之路，以作当今浙江文学发展之借鉴，使“重振浙军雄风”之类的话题落到实处，该是一件十分迫切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目 录

引论	(1)
----------	-------

上篇 思潮论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面海中国”的地域文化冲击波

一 “小传统”积淀引发的新文学内源性自觉	(4)
二 “面海的中国”：外向拓展意识推动文学新潮	(12)
三 两浙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之于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	(19)
四 两浙文风：文化传承与新文学生成观照	(30)

第二章 “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运动

一 主导五四文学新潮	(36)
二 引领“30年代文学”潮流	(53)
三 在战时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67)

第三章 新文学建设中“浙军”的中坚作用

一 新文学社团的担纲组建之功	(97)
二 新文学文体的探索创造价值	(115)
三 新文学诸种流派的领衔地位	(137)

第四章 “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思潮

- 一 现实主义：挺立潮头与持续推进 (168)
- 二 浪漫主义：推动浪漫文学思潮的大本营 (195)
- 三 现代主义：文学新潮的拓荒与探寻 (207)

下篇 创作论

第五章 浙江小说家与中国现代小说潮

- 一 现代性：小说理念的变革 (223)
- 二 浙江现代小说潮的整体价值 (229)
- 三 现代小说流派的多元创造 (247)

第六章 “浙江潮”与中国新诗潮

- 一 确立现代意识的诗学观念 (268)
- 二 “浙江潮”作为中国新诗潮的缩影 (285)
- 三 中国新诗理论的开拓者之功 (318)

第七章 中国现代散文的创新与浙江散文家的贡献

- 一 “散文大国”中的一方沃土 (329)
- 二 现代散文：开拓和改造之功 (346)
- 三 周氏兄弟对两种现代散文风格的奠基意义 (363)
- 四 浙江现代散文家的流派开创价值 (386)

第八章 中国现代戏剧建构中“浙军”的建树

- 一 戏剧认知：确立文学“正宗”地位 (405)
- 二 改造和建设：戏剧理论建树 (417)
- 三 戏剧文学创作的创造性成就 (443)
- 四 戏剧的拓展：与电影联姻 (459)

后记 (470)

上篇 思潮论

第一章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面海中国” 的地域文化冲击波

20 世纪初诞生的中国新文学，呈现出与有数千年积累的中国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质地，其生成方式与发展态势也是各不相同的。已行进几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学何以会发生“突变”，生成另一种从文学观念到语言形式与传统文学迥异的新文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一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源起，是取决于内源性自觉与外助力推动两重因素。内源性自觉主要表现为“传统内”生成的变革因素，即传统本身日积月累形成一种变革精神，构成对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大传统”在融合中的对立并使对立日趋尖锐化，终呈对固有文化传统的颠覆之势，由此使中国文学建构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外助力推动显系指外来文化思潮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冲击，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文学）思潮以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的根本改造。应当说，这两重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以此作为切入口，当有助于揭示中国新文学源起中的诸多关键性问题。

研究作为地域文学典型的“浙江潮”文学个案，首先可以进